

艰苦岁月 忍辱负重 敦煌事业的带头人

孙儒侗

(敦煌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中图分类号: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3-0008-02

段先生是1946年9月到敦煌的,我比他晚一年到敦煌。我来时除了段先生外,还有霍熙亮先生、范文藻先生(后来去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我是学建筑的,但我对敦煌的建筑一窍不通,对石窟艺术也是一点也不懂。我们去后是段先生给我们讲解,才使我们走进了敦煌艺术的殿堂。50年代以后来的同志,差不多也都是段先生引导大家走进敦煌艺术殿堂的。

40年代到60年代这30年间,去敦煌的同志大多是搞艺术的。1958年成立了兰州艺术学院,常书鸿就去兰州,长期不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先生实际上就是敦煌研究的带头人。从1946年到敦煌,直到1976年,这几十年,段先生是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这期间历次对外展览,他都参与计划和组织工作,如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莫高窟第217窟等洞窟的原大复制临摹工作,都是在1976年以前完成的,而这期间,他在政治上非常坎坷。1957年反右,当时想要把他打成极右,可是又找不出证据来,没有打成,硬给他安了个什么罪名。当时他的工资降得很厉害(只有四十块钱左右的生活费),他的生活很艰苦。那时弄了个所谓“四川帮”,段文杰、史苇湘包括我和李其琼、欧阳琳等,因为都是从四川来的人,我们几个戴了帽子,他虽然没有戴帽,但也是受到冲击的人。直到60年代初,才给“四川帮”彻底平反了。

即使是挨整的那些年代,每年所里定工作计划、规划等,却又是段文杰先生来负责的。因为常书

鸿所长常年不在敦煌,当时的负责人只知道发号施令,业务方面也搞不出来,还是要老段来做具体工作。文革开始以后,又把这批人打成什么“分子”之类,段先生被下放到敦煌的农村去了,我和老伴也被扫地出门,逼迫我们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

反右、文革都对他有很大影响,可是就在各种政治风波冲击的时期,敦煌的很多临摹和研究工作却是在这个期间做出来了,而且临摹工作的重要部分都在这个时期做出来了。那时的工作主要还是靠段先生支撑着,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

从生活上看,解放前的几年间,从我1947年到敦煌直到新中国成立,没有见他添置过一件新衣。国民政府垮台之前的几年,常常没有经费。冬天房间很冷,所有搞美术的人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生一个火炉。我们自己的房间里没有火炉,所有装水的东西,如果晚上不处理掉,第二天就会冻得硬硬的。我们睡觉时要用绳子把被子的下部扎起来,否则会透风,是很冷的。早上起来被头上都是霜。实在冷得没办法,我跟他商量学着本地人烧炕,用粪渣子、树枝等可燃的东西塞到炕洞里烧,我跟老段住隔壁,两个房间共用一个烟筒。我们是南方人,不太会烧炕,有时烧好了还可以,如没有烧好,半夜没有火了,仍非常冷;有时又烧得太热,人躺在炕上就象烙饼子一样,烫得没法睡。我们大概烧了不到一个月,因始终掌握不好,后来干脆不烧了,晚上就在办公房间炉子边看看书、画点画什么的,直到很晚才回到自己房间睡觉。那时年轻,就这样顶过来了。

收稿日期 2011-04-01

作者简介 孙儒侗(1925—)男,四川省新津县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保护研究所原所长。

记得在 1948 年 ,国民党快完蛋的时候 ,生活很困难 ,没有吃的 ,有人建议我们养羊。后来我跟老段两人商量合买了一头母牛 ,这样就可以每天挤牛奶喝 ,改善一下生活。母牛很快就下了一头小牛 ,也是母牛。当时还有人羡慕我们说“母牛下母牛 ,三年五条牛”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 ,每天只让牛吃草 ,没有适当的饲料 ,牛就饿得精瘦 ,牛奶也少了。后来养不了了 ,只好把牛卖掉。卖牛的钱我请常先生在南京给我买件衣服 ,当时的物价飞涨 ,这半头牛的钱 ,最后只买了件衬衫。为了维持生活 ,当时所里好些人都养鸡养羊 ,养了鸡还可以吃鸡蛋。我们后来又养了羊 ,可以喝些羊奶。吃的菜也是自己种 ,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劳动技能。后来文革中的困难时期 ,老段与他的爱人龙时英还养兔子 ,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段先生是很乐观的 ,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 ,他依然专心于壁画临摹工作。冬天天气冷无法上洞子(窟)画画 ,尤其是不能调颜色了 ,但是可以起稿 ,为第二年的工作作准备。每个人都有一些任务 ,按专题来分 ,如段先生他主要画供养人等 ,欧阳琳则是搞图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专题。那时规定不能按原大画 ,因为在此前张大千临摹的办法是用纸贴在墙上起稿(当时没有像现在的涤纶薄膜之类的透明纸 ,张大千是从四川带来的宣纸 ,拿煤油浸透 ,还要趁煤油未干之时 ,贴在墙上描出底稿) ,对壁画的损坏很大。研究所成立后 ,常书鸿坚决禁止那种破坏壁画的做法 ,为了防止有人贴墙印稿 ,就规定不能用原大 ,总是要比原大缩小一点。临摹中不能损坏壁画 ,这是我们长年在敦煌工作的一个共识。记得是 1954 年 ,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一些教师带着学生到莫高窟临摹壁画好几个月 ,研究所的人对这些大学的师生们都很热情 ,但有一天段先生发现有人在洞窟里用图钉把纸贴在墙上印稿 ,段先生马上制止了这种做法。这件事还报到文物局 ,进行了通报批评。这件事说明段先生对敦煌壁画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解放初期 ,1951 年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敦煌

展览以后 ,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1952 年决定搞原大复原临摹洞窟 ,要给人一个真实的感觉 ,把一个洞窟完整临摹下来 ,让外地的观众能看到整体。这种震撼是一个个单幅画所不能代替的。首先临摹第 285 窟 ,搞这样大型的洞窟 ,又不能把纸贴在墙上起稿 ,只好用尺子量好尺寸 ,按比例一点一点画 ,全部是这样起稿 ,所以这个洞窟临摹品在准确度上是有些出入的。

50 年代 ,常先生经常不在敦煌 ,这里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段先生主持。第 285 窟搞完又去榆林窟临摹 ,那时是冬天 ,榆林窟很冷 ,也没有房子 ,段先生和男士们就到睡佛殿搭地铺。那个不算窟 ,实际上是一间房子 ,到处都是窟窿眼。从 1955 年开始正式临摹 ,直到 1957 年“反右”之前 ,在榆林窟完整临摹了榆林窟第 25 窟和另外一些洞窟单幅的画面。榆林窟第 25 窟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段先生自己临摹了南壁的巨幅观无量寿经变。

后来就是反右、大跃进、经济困难时期 ,直到 1962 年才又开始正常的工作 ,但是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最艰苦的日子。然而从 1946 年到 1976 年 ,这 30 年间临摹的作品是本院最好的作品 ,包括到现在为止 ,敦煌研究院拿出去搞展览的重要作品还是这一时期的临摹品。

临摹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古代绘画“六法”中就有“传移模写” ,现在我们认识古代绘画大多是靠临摹品 ,比如展子虔《游春图》已经证明是唐人临摹的 ,但这件作品在美术史上依然有其重要的价值。在美术史上 ,这样的例证很多。段先生组织研究所的人画画 ,他自己非常注意练功 ,从解放前就练手 ,除了理解之外 ,功夫是很重要的 ,没有高超的技巧 ,所谓“传神”是传不出来的。常书鸿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的道路 ,几十年来 ,真正走得好的还是段先生。

段先生逝世 ,我们作了一幅对联 ,以作纪念 :
莫高窟里 ,艰难岁月 ,妙笔犹传艺术神韵 ;
鸣沙山下 ,辛勤耕耘 ,创建敦煌研究平台。